

贾平凹《古炉》论



为一部新出版不久的当代小说写一部长篇的专论，他完全是在挑战俗常对于文学评论的定识。一般同行于此行径，嫉妒讥笑之余仍是不齿。他似乎在讨好贾平凹，可他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要说讨好，我看他也只是在讨好《古炉》，讨好一部好的长篇；讨好，而甘受文学的蛊惑和驱使。这是为什么呢？傻得可爱；单纯到幼稚的地步，便是一种痴迷与痴爱。他的这般情怀如今已然稀缺而变得孤立，不得不让人感动。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王春林
—著

阅读 (410) | 目录 | 我要评论

贾平凹《古炉》论

王春林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贾平凹《古炉》论 / 王春林著 .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 2015.5

ISBN 978-7-5378-4387-4

I . ①贾… II . ①王… III . ①长篇小说—小说评论—中国—当代

IV . ①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5946 号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84364428 (北京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真: 0351-5628680 010-84364428

网址: <http://www.bwyw.com>

E-mail: bwyw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字数: 133 千字

印张: 11.25

版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5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4387-4

定价: 29.80 元

序

/ 续小强

新世纪以来，王春林的文学评论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如此判断，是以读者、作家、高校、作协等的各类反应为依据的。一个特别苦的行当，一种长居幕后的写作，以文学评论目前的影响，以所居地域的偏远，他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便是殊为不易的。他，一定是付出了超常的劳动。

为一部新出版不久的当代小说写一部长篇的专论，他完全是在挑战俗常对于文学评论的定识。一般同行于此行径，嫉妒讥笑之余仍是不齿。他似乎在讨好贾平凹，可他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要说讨好，我看他也只是在讨好《古炉》，讨好一部好的长篇；讨好，而甘受文学的蛊惑和驱使。这是为什么呢？傻得可爱；单纯到幼稚的地步，便是一种痴迷与痴爱。他的这般情怀如今已然稀缺而变得孤立，不得不让人感动。

未履行任何手续，王春林将《古炉》认定为“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如果他是一位什么主席，大约为了屁股计，他一定不会讲得这么狠，而为了和好的平衡，他也一定不会讲得这么绝。好在他只是一位蜗居太原且与各类中心不搭界的评论家。说自己想说的话，即便是表扬个

人与表彰中国，竟也是不易的。

讲了狠话，就会有人跟上来。有些人把它当成靶子，准备了许多炮弹、导弹，轰炸与攻击，这也都是正常的。生死善恶便是生态的平衡。我读过《古炉》，许多读过《古炉》的人们，并没有被这些重武器喝倒，如今还在咀嚼《古炉》的滋味，纵然渺小得过分，也却是对王春林的鼓励与帮扶。

从这部专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窥测到王春林文学评论的程式。他的体量庞大。他的单篇评论常以万言计，对《古炉》而成数十万言专论，便不奇怪了。

2 他的精神底子，核心是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人道主义。这一文学立场，即是他的文学评论的精神坐标。他一再强调《古炉》的“文革”书写，和此紧密相关。

他的理论方法，主要源自西方。从这一部专论的组织架构去看，是再显豁不过了。以彼之矛，攻己之盾，不仅是他，也是当代文学评论家的主要策略。在这一阴影下，他们不断地挣扎挣脱，与文学创作比拼，在“历史”“意识形态”之外，从未放弃寻找自身批评话语的努力。在这一专论中，“乡村世界的常态化书写”的概念展开，以及贾平凹“生活流式的叙事”探讨，都可看作他个人化的努力。因之于他文学评论家的身份特性、文学评论文本形式的局限以及其个人语言表达的阻隔，这些个人化的发现未得到深入的挖掘，是极为遗憾的。

对于小说人物形象的分析，王春林特别注意的是女性人物。如果从其过往的文学评论中进行抽取，编辑一册女性人物的专论集，大约是毫不费事的。这还不一定就是王春林的故意，老实说，我们文学的男性书写确实十分贫弱。在这部专论中，他也特别地论说了“蚕婆”和“杏开”

两位女性。他更看重的，是女性人物形象塑造背后的文化意味。而我认为，如此这般是有愧于小说家对于女性的态度的。

作为王春林的学生，我为有这样的老师感到骄傲。但对于他文学评论的“语文状态”我一直是持批评态度的。如此情绪，甚至是我2000年后放弃文学评论写作与阅读的一条导线。“语文状态”是我生造的一个词组。最近几年，学界关于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语文问题已经有许多讨论，这对他，仍是可作为必须警惕的一个问题。

王春林与我亦师亦友多年，我们共同经历了太多文学与生活的事故。我一直把他当成一个典型的“亚斯伯格症”(Asperger's syndrome)患者，而多少年下来，他也就仍然如此。他的胡子，他的体型，他的酒风，他在山西大学的疾行，他遗留文坛的种种掌故，是其文风之外的骨风。这些开阔而悠长的文学记忆，与他的煌煌文章一道，便交织而成我心目中的评论家王春林了。

第一章：“文革”书写与乡村常态世界 / 001	01
第一节 “文革”书写 003	
第二节 乡村常态世界 012	
第二章：日常叙事与悲悯情怀 / 021	
第一节 日常叙事 023	
第二节 悲悯情怀 029	
第三章：人物形象论（一） / 039	
第一节 狗尿苔 044	
第二节 蚕婆 051	
第三节 善人 055	
第四章：人物形象论（二） / 061	
第五章：人物形象论（三） / 079	
第一节 朱大柜 081	

02	第二节 杏开	092	1001	第四章：杏子“革命” / 第一章 核心 芦沟“革命” / 第二章 第六章：叙事艺术（一） / 099	1001	第五章：杏子“革命” / 第二章 核心 芦沟“革命” / 第三章
	第七章：叙事艺术（二）	111	1101	第五章：杏子“革命” / 第二章 核心 芦沟“革命” / 第一章	1101	第六章：叙事艺术（二） / 111
	第八章：象征手法及其他	/ 133	090	第六章：叙事艺术（二） / 111	090	第七章：叙事艺术（二） / 111
	第九章：“伟大的中国小说”？	/ 155	1301	（一）创造新新人物 / 第三章 人物 芦沟“革命” / 第一章 人物 芦沟“革命” / 第二章 人物 芦沟“革命” / 第三章	1301	（二）创造新新人物 / 第三章 人物 芦沟“革命” / 第一章 人物 芦沟“革命” / 第二章 人物 芦沟“革命” / 第三章
			0701	（三）创造新解人 / 第三章 人物 芦沟“革命” / 第一章	0701	（三）创造新解人 / 第三章 人物 芦沟“革命” / 第一章

第一章

“文革”书写与乡村常态世界



第一节 “文革”书写

003

读解《古炉》，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这是一部典型的“文革”叙事小说。我们虽然不是简单的题材决定论者，但如果无视于题材的意义价值，很显然也无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剖析贾平凹的《古炉》。我们注意到，在《古炉》的后记中，贾平凹不无感慨地写道：“对于‘文革’，已经是很久的时间没人提及了，或许那四十多年，时间在消磨着一切，可影视没完没了地戏说着清代、明代、唐汉秦的故事，‘文革’怎么就无人有兴趣呢？或许是不堪回首，难以把握，那里边有政治，涉及评价，过去就过去吧。”实际的情况，较之于贾平凹的说法，略有出入。根据我并不完全的观察，仅仅局限于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领域，诸如毕飞宇的《平原》、余华的《兄弟》、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东西的《后悔录》、阿来的《空山》、莫言的《生死疲劳》与《蛙》、苏童的《河岸》、虹影的《好儿女花》，等等，就曾经以全部或者极大的篇幅涉及了对于“文革”的描写。然而，虽然以上作品均涉及了关于

“文革”的描写，但在实际上，其中因为对“文革”的表现而特别引人注目者，其实是寥寥无几屈指可数的。在我看来，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固然可能是因为作家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文革”的思考与表现上，但在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恐怕却是因为以上作品对“文革”的透视与反思并没有抵达应有的深度和力度，并未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当然，更进一步地追究起来，则此种情况的形成，也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受制于我们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禁锢，二是作家个人的艺术功力终究有限。别的且不说，单就贾平凹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能够打破某种无形的思想禁锢，能够以《古炉》这部多达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巨制对“文革”进行正面表现，能够艺术地书写出自己个人的但同时却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文革”记忆来这样一种写作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写作勇气的存在。更何况，与“文革”结束后迄今为止出现过的其他“文革”叙事小说相比较，贾平凹的这部《古炉》，确实可以被看作是对“文革”的透视与表现最具个人色彩最具人性深度最具思想力度的长篇小说。以往，我们总是在感慨，与西方文学在二战结束之后，对于二战所进行的足称通透深入的艺术反思相比较，我们在经历了“文革”这样一场空前的民族浩劫之后，却并没有能够产生具有相应思想艺术力度的文学作品。有了贾平凹《古炉》的出现，我想，我们终于可以不无自豪地说，中国确实产生了一部可以与西方文学相对等的堪称伟大的“文革”叙事小说。

作为一部“文革”叙事小说，《古炉》首先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格外真实地写出了“文革”这样一场民族苦难悲剧的惨烈程度。关于《古炉》的具体写作动机，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说得很明白：“也就在那一次回故乡，我产生了把我记忆写出来的欲望”“之所以有这种欲望，一是记忆如

下雨天蓄起来的窖水，四十多年了，泥沙沉底，拨去漂浮的草末树叶，能看到水的清亮，二是我不满意曾经在‘文革’后读到的那些关于‘文革’的作品，它们都写得过于表象，又多成了程式。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我应该有使命。”在这里，贾平凹一方面强调书写“文革”乃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一种责任与使命，另一方面则也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其他“文革”作品的不满。既然不满意于其他的“文革”作品，那么，贾平凹自己所写出的又是怎样的一种“文革”小说呢？对于这一点，贾平凹在后记中，也同样有所揭示：“我的旁观，毕竟，是故乡的小山村的‘文革’，它或许无法反映全部的‘文革’，但我自信，我观察到了‘文革’是怎样在一个乡间的小村子里发生的。如果‘文革’之火不是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点起，那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却怎样使火一点就燃？”“我的观察，来自于我自以为很深的生活中，构成了我的记忆。这是一个人的记忆，也是一个国家的记忆吧。”正如贾平凹所言，这部小说所讲述的全部故事，都发生在这个名叫“古炉”的异常贫瘠的小山村里。这样，一个必然会引起的问题就是，发生在一个如此不起眼的小山村里的“文革”故事，难道就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文革”故事么？其实，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离开了如同“古炉”这样的具体地域，我们的中国又在什么地方呢？这就如同曹雪芹的《红楼梦》可以通过对于贾氏家族的表现而完成对于古代中国形象的揭示一样，既然曹雪芹的《红楼梦》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和接受，那么，贾平凹为什么就不能够通过对“古炉”这个小山村解剖麻雀式的描写而揭示中国的“文革”故事呢？小说小说，就贵在其小，贵在它通过对鲜活灵动的生活具象的描写而达到揭示生活本质存在的写作意图。我们之所以在史学著作之外，仍然需要阅读如同《古炉》此类“文革”叙事小说者，其根本的原因恐怕也正在于此。实际上，在这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贾

平凹的《古炉》写作，乃是完全地建立在自己的个人记忆基础之上的。小说固然具有公共性的一面，但所有优秀的小说却又都是通过个人性才能够抵达所谓公共性的。这就正如同曹雪芹《红楼梦》的写作是绝对忠实于个人记忆一样，贾平凹的写作也是忠实于个人记忆的。既然我们不会因为曹雪芹的个人记忆而否认《红楼梦》的公共性，那么，也就同样不能因为贾平凹的个人记忆而否定《古炉》的公共性。我想，贾平凹之所以刻意地强调《古炉》既是“一个人的记忆”，也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根本的着眼点其实就在于此。实际上，对于作家所描写着的古炉小山村的“文革”与中国“文革”之间的内在紧密联系，贾平凹自己就从词源学的意义出发，有过极明白的说明：“在我的意思里，古炉就有中国的内涵在里头。‘中国’这个词，以前在外国人眼里叫作‘瓷’，与其说写这个古炉的村子，实际上想的是中国的事情，写中国的事情，因为‘瓷’暗示的就是‘中国’。而且把那个山叫作中山，也都是从中国这个角度整体出发进行思考的。写的是古炉，其实想的都是整个中国的情况。”^[1]

读罢《古炉》，印象最深的情节之一，恐怕首先就是贾平凹在小说后半部中关于古炉村武斗情形的鲜活描写。通过黄生生等来自于外部世界的人们的宣传鼓动，“文革”自然也就逐渐地在古炉村慢慢地蔓延开来。在县里分别出现了“无产阶级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与“无产阶级造反联合总部”（简称“联总”）之后，本来属于化外之地的古炉村也就随之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一派是属于“联指”的以霸槽为首的榔头队，另一派则是属于“联总”的以天布为首的红大刀队。面对着

日益凸显出的权力与利益，两大阵营渐渐地进入了一种剑拔弩张的争斗状态之中，以至于最后

[1] 贾平凹语，见《古炉》封底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终于酿成了导致多位村民死伤的武斗。整部《古炉》的六十多万字分别由“冬”“春”“夏”“秋”以及第二个“冬”“春”六部分组成，其中第二个“冬”部，所集中描写展示的，就是榔头队与红大刀队之间惨烈到了极点的武斗故事。粗略计来，这一部分的字数差不多有十五万字，大约占到了小说总字数的四分之一。虽然在我一向的感觉中，贾平凹似乎是一位更多具有优柔品格的人，刚烈这样的语词殊难与他发生关联，但是在认真地读过《古炉》中关于武斗的描写部分之后，你却会不无惊讶地发现，原来，一贯优柔的贾平凹其实也有着极为刚烈的一面。道理说来也非常简单，若非性情刚烈者，是很难浓墨重彩地写出武斗这样真可谓血淋淋的惨酷场面来。说实在话，我读过的“文革”小说也不可谓不多，但能够以其状况的惨烈而给我留下噩梦般的印象者，可能真的只有《古炉》这一部。“马勺仍是不松手，牙子咬得嘎嘎嘎响，能感觉到了那卵子像鸡蛋一样被捏破了，还是捏。跑到塄畔下的人听到迷糊尖叫，跑上来，见迷糊像死猪一样仰躺在那里，马勺还在捏着卵子不放，就拿棍在马勺头上打，直打得脑浆都溅出来了，才倒下去，倒下去一只手还捏着卵子，使迷糊的身子也拉扯着翻个过。”“灶火就往前跑，眼看着到了池沿了，咚的一声，炸药包爆炸了。支书的老婆被爆炸的声浪掀倒在地，一个什么东西重重地砸在她的身上，等烟雾泥土全都消失了，县联指和榔头队的人去察看现场，支书的老婆才爬起来，她看见就在她脚下有一条肉，足足一拃半长的一条肉，看了半天，才认得那是一根舌头。”我想，或许有批评者会以所谓低俗的自然主义之类的言辞来指责贾平凹如此读来令人震惊的武斗场景描写。但我以为，倘不如此，就很难写出“文革”、武斗给我们这个民族所造成巨大苦难。实际上，在读到《古炉》中如此惨酷如此鲜血淋漓的场景描写时，我所惊讶佩服的，正是贾平凹面对惨烈

的死亡场景时的冷静客观不动声色。在某种意义上，大约只有如贾平凹这样一种对于“文革”中武斗场景的描写，才真正当得起所谓如实写来绝无伪饰的评价。

从阅读的本能直觉来说，读贾平凹的武斗场景描写，所带给读者的感觉似乎是在榔头队与红大刀队之间肯定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若非如此，本来同属于一个村庄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他们，却又有何必要非得打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不可呢。然而，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以霸槽为首的榔头队与以天布为首的红大刀队之间，并不存在着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冲突。虽然说这两个战斗队分别隶属于县“联指”和县“联总”，但说实在话，即使是这两派的为首者霸槽和天布，也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作“文化大革命”，不懂得他们之间为什么会出现一种剑拔弩张的尖锐对立关系。某种意义上，《古炉》中两派之间的激烈争斗，居然能够让我联想起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来。如果说《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两党争斗不已的原因是吃鸡蛋到底应该先打破大头还是先打破小头，那么，到了贾平凹的《古炉》之中，两派之间的争斗甚至于连如何吃鸡蛋这样微不足道的理由都无法找到。一句话，毫无缘由地便互相纠缠混战在一起，正是古炉村“文革”武斗的一大根本特点所在。而这一点，正好可以用来诠释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曾经强调过的：“我观察到了‘文革’是怎样在一个乡间的小村子里发生的。如果‘文革’之火不是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点起，那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却怎样使火一点就燃？”其实，在这段话中，贾平凹已经强有力地暗示着自己这部“文革”叙事小说的基本特征，正是要充分地揭示出“文革”究竟是怎样在古炉这个小山村中发生的，要告诉读者为什么如同古炉这样的中国最底层乡村竟能够使得“文革”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就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在这里，

贾平凹的特出之处，乃在于他非常深刻地揭示出了“文革”的发生发展与人性尤其是人性中恶的一面的内在密切联系。某种意义上，《古炉》既是一部真实书写“文革”历史的长篇小说，更是一部借助于“文革”的描写真切地透视表现着人性的长篇小说。一方面，“文革”的发生，乃是人性中恶的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但反过来在另一方面，“文革”的逐渐向纵深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着人性恶的日益膨胀。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把古炉村其实也就是中国的惨烈“文革”面貌挖掘表现出来，事实上也正是我们充分肯定贾平凹的《古炉》，并且把《古炉》看作是迄今最成熟最优秀的“文革”叙事小说的根本原因所在。

比如说，“文革”在古炉村的缘起，就很显然与霸槽此人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如果不是他三番五次地外出县城与洛镇，那么，如同黄生生这样外来的红卫兵就很难在古炉村产生影响，古炉村“文革”的发生自然也就不会是现在的这样一种状况。那么，霸槽又为什么要三番五次地离村外出并与黄生生之流打得火热呢？根据小说中的描写，霸槽的行为动机大约也不外这样几个方面：其一，霸槽的天性中就有着某种不安分的因子，可以说是古炉村中最具个性的青年农民之一。“文革”前，朱大柜可谓是古炉村一手遮天的支书，但霸槽却偏偏就没有把朱大柜放在眼里：“霸槽说：朱大柜算个屁！狗尿苔惊得目瞪口呆了，朱大柜是古炉村的支书，霸槽敢说朱大柜算个屁？”仅此一个细节，就已经透露出了霸槽那不安分的天性。其二，霸槽虽然天性不安分，虽然很有一些能力，但在“文革”前秩序井然的古炉村，却有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强烈感觉。“古炉村应该有个代销店其实是霸槽给支书建议的，结果支书让开合办了而不是他霸槽。……霸槽是个早就觉得他一身本事没个发展处，怨天尤人的，要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那肯定要不服的。支书就说：让他去成精